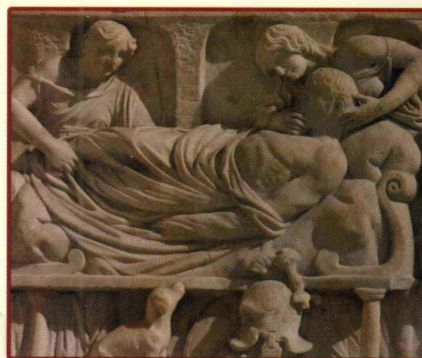


ZHONGXIBIJIAOSHIXUEDEYUYANCHANSHI

中西比较诗学的语言阐释



中西诗学对话在大大拓展了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视野及思路的同时，自身也面临了一系列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走向对话的中西比较诗学由此成为比较学界令人瞩目的焦点。

范方俊／著



人民
出版
社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中西比较诗学的语言阐释”项目结项成果

中西比较诗学的语言阐释

范方俊 著



责任编辑:张益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比较诗学的语言阐释/范方俊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

ISBN 978-7-01-011942-7

I. ①中… II. ①范… III. ①比较诗学—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I207.22 ②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8413 号

中西比较诗学的语言阐释

ZHONGXI BIJIAOSHIXUE DE YUYAN CHANSHI

范方俊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5

字数:586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1942-7 定价:7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绪 论	中西诗学对话的危机：走向诗学的语言阐释之途 /001
	一、中西诗学对话的缘起 /001
	二、中西诗学对话的危机 /007
	三、走向语言阐释之途 /013

上编：中西诗学话语的分野

第一章	中西诗学的基本观念与核心范畴 /021
	第一节 从《文心雕龙》的“言志抒情”看中国传统诗学的 “诗言志”说 /021
	第二节 从《诗学》的“诗即摹仿”看西方传统诗学的 “摹仿说” /035
	第三节 从《文心雕龙》的主要文论范畴看中国传统诗学 范畴的基本特征 /048
	第四节 从《诗学》的主要文论范畴看西方传统诗学 范畴的基本特征 /65
第二章	中西诗学的体系架构与话语言说 /82
	第一节 《文心雕龙》的诗学体系架构 /82

第三章

- 第二节 《诗学》的文学理论体系架构 /101
- 第三节 《文心雕龙》的语言观及话语言说 /113
- 第四节 亚里斯多德的语言观及《诗学》的话语言说 /129
- 中西诗学的理论指归与意义生成 /145
 - 第一节 “原道”：《文心雕龙》的理论指归 /145
 - 第二节 “原理”：亚里斯多德《诗学》的理论指归 /158
 - 第三节 “徵圣”与“宗经”：《文心雕龙》的意义生成 /172
 - 第四节 科学证明：亚里斯多德《诗学》的意义生成 /183

中编：中西诗学话语的融合

第四章

- 中西诗学话语的历史性交汇 /199
 - 第一节 近现代之交的中国诗学转型与王国维的学术使命 /199
 - 第二节 王国维对诗学话语的关注与中西“化合”说的提出 /211
 - 第三节 《〈红楼梦〉评论》：引入西方诗学研究范式的尝试 /220
 - 第四节 由“欧穆亚”、“古雅”看王国维对中西诗学话语的“化合” /232
 - 第五节 从《人间词话》看王国维对中西诗学话语的“化合” /243

第五章

- 中西诗学话语的融合（上） /255
 - 第一节 话语的诱惑：从《无言之美》、《诗之无限》看朱光潜诗学研究的起点 /255
 - 第二节 作为融汇中西诗学话语先驱的王国维与朱光潜 /261
 - 第三节 朱光潜对于中西诗学话语的认知及对中国现代诗学话语的提倡 /268
 - 第四节 “阐发”的范例：从《文艺心理学》看朱光潜对中国现代诗学话语的再造（上） /277

	第五节 “比较”的结晶：从《诗论》看朱光潜对中国现代诗学话语的再造（下） /288
第六章	中西诗学话语的融合（下） /307
	第一节 从钱锺书对王国维的评价看钱氏诗学研究的切入点 /307
	第二节 从对莱辛《拉奥孔》的“论”和“读”看钱锺书与朱光潜对于诗学研究话语的不同取舍 /314
	第三节 “以故为新”之一：《谈艺录》及其对传统诗话的改造 /326
	第四节 “以故为新”之二：《宋诗选注》的现代意义 /335
	第五节 “以故为新”之三：《管锥编》对于传统读书札记的“破体”和对中西诗学话语的反思 /347

下编：中西诗学话语的转换

第七章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361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论的“失语”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提出 /361
	第二节 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方法论根基 /379
	第三节 范畴的转换：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起点 /385
	第四节 观点的转换：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中点 /396
	第五节 体系的转换：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终点 /408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 /420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问题的提出 /420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方法论原则 /431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的契合与融通 /440
	第四节 中国现代文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的吸纳与调适 /448

第九章

第五节 中国当代文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
应对和深化 /459

西方文论的异质性和中国化转换 /471

第一节 西方文论的异质性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
两次转型 /471

第二节 西方化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建构：
策略还是无奈？ /482

第三节 中西文论的同质同构：西方中心主义的
中国式解构 /502

第四节 中西文论的异质同构：西方中心主义的
中国式建构 /518

第五节 在比较和对话中推进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转换 /534

结 语 二十一世纪中西诗学的“复调”对话和“杂语”共生 / 540

论文主要引用及参考书目 / 544

后 记 / 551

绪 论

中西诗学对话的危机：走向诗学的语言阐释之途

当代社会是一个强调对话的社会。人们不仅关注形形色色的对话理论，如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交流与对话理论、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小说对话理论、伽达默尔（Georg Gadamer）的哲学解释学对话理论、托多洛夫的文学对话理论以及花样翻新的诸种后现代主义对话理论等等，而且热衷于各个领域内的“对话”：政治对话、经济对话、文化对话、哲学对话、文学对话、家庭对话，等等，不一而足。

在对话成为时代主潮的背景下，中西比较诗学的基点也一跃从“比较”转向了“对话”，走向对话成为中西比较诗学发展的必由之路。^①而中西诗学对话在大大拓展了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视野及思路的同时，自身也面临了一系列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走向对话的中西比较诗学由此成为比较学界令人瞩目的焦点。

一、中西诗学对话的缘起

中西诗学对话既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碰撞下的时代产物，同时也是诗学自身领域内中西两大诗学体系互为“他者”、反省自我的必然结果。究其根源：

首先是中国传统诗学在西方诗学冲击下凸显出的“现代转型”使然。中国传统诗学是对从先秦时期开始直至近代中西诗学发生实质性接触前的中国古典文论的概称。中国古典文论是在自身文化系统内生发的一套诗学体系，无论是在内在的文化底蕴还是外在的理论表述上都迥异于西方诗学。作为中

① 参阅乐黛云等：《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诗学一直受到中国学人的珍视。然而，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急遽变化，中国传统诗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当时整个时代氛围密切相关的。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古老的中华封建帝国一下子从四方仰慕的天朝大国沦落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当时一批具有先进意识的先觉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方的巨大落差不仅体现于政治、经济、军事层面，同时也体现于思想文化层面。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戊戌变法的流产更让他们痛楚地意识到，仅仅依靠军事上的“船坚炮利”和政治上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不可能挽救中国，唯有借助思想文化的启蒙，发动民众，实现近代中国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由于中国旧有的文化传统长期陷于自我封闭之中，已不可能自主生发出时代迫切需要的近代思想意识，人们只好“别求新声于异邦”，向西方寻求先进的思想文化真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就此走向“全盘西化”的道路，这一方面是由于先觉者们浸染于中国传统文化太深，在感情上对其难以割舍，另一方面他们在引介西方文化之时已理智地察觉到了它的不足。因此，他们引入西方文化并不是用它来替代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要借助西方文化的参照，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国传统诗学即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自身的现代转型的。早在1905年王国维就撰文《论近年之学术界》指出，中国“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①王国维肯定了西洋新学语的输入对于转型中国传统诗学的必要性，但他同时指出，中西学术话语各有其片面性，不能盲目认定西方的学术方式就是绝对地好，应该借鉴西洋文学批评的长处来补足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不足。1908年青年鲁迅也在《摩罗诗力说》中宣称：“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②进入二十世纪30至40年代，随着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深入，以朱光潜、钱锺书为代表的中国比较学者更加注意到在中西诗学的融通中“转型”中国传统诗学，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实绩。建国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被迫中断，中国的文学理论一股脑儿地倒向了苏俄文论。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现当代文化的大量涌入，中国文论又一边

①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

②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倒向了西方现当代文论。于是，当人们冷静地审视当代中国文论的现况时，有关中国传统诗学现代转型的呼声再次在中华大地上空响起。回顾中国文论近百年间经历过的风风雨雨，实现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可谓是一个世纪性的主题。如果说十九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传统诗学现代转型的提出更多的是出于时代的召唤的话，那么当代对于中国传统诗学现代转型的期盼则主要是基于对诗学自身发展规律的现实考察。历史的因缘决定了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不可能从旧的诗学传统中自动生成，而诗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也不允许中国传统诗学完全依靠照搬其他民族的诗学实现“现代转型”，因此，寻求与西方诗学的对话就成了中国传统诗学实现自身现代转型的必然抉择。

其次是西方比较诗学界对于包括中国传统诗学在内的东方文化视野的吸纳使然。美国学者厄尔·迈纳（Earl Miner）在其近作《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札记》一书中，令人信服地指出：东西方的原创型诗学体系都是在各自的文化系统中产生的，“跨文化”是比较诗学的最根本性的特征，对于一本论述比较诗学的专著来说，所采用的例证必须是跨文化的而不是同一文化体系之内的，因为“我们无法把相同的东西作为比较的对象。要进行比较研究，被比较的对象之间必须存在某种差异；否则，我们只是在鉴定而不是比较”，^①“然而，我们的‘比较文学’为什么就该缺乏一种东半球和南半球的视野呢？”^②迈纳的上述见解无疑代表了西方比较学界在比较诗学方面的新的动向。众所周知，西方奠基于亚里斯多德（Aristotle）《诗学》之上的理论体系，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内的表述方式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从根本上讲，它们是属于同一个西方文化圈内的诗学体系。相比之下，中国传统诗学则完全属于另一个与西方文化几无直接关联的异质文化圈。巨大的文化差异过去曾使不少西方学者对中西诗学比较的可行性感到难以想象。然而，比较诗学的“跨文化”特征决定了比较诗学必须要有勇气去跨越不同的文化圈子，否则，比较诗学很难名副其实。而且，中西诗学间的巨大差异固然给中西比较诗学在整体研究上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它同时也为比较诗学研究走向深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因为完全“非西方化”的

① [美] 厄尔·迈纳：《比较诗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几个课题》，见乐黛云、张文定主编：《比较文学》，中国文化书院 1987 年版，第 430 页。

② [美] 厄尔·迈纳：《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札记》，王宇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8 页。

中国传统诗学不仅为西方诗学提供了一面反视自我的“镜子”，而且更为难得的是，在许多方面中国传统诗学都与西方诗学有着一种令人瞩目的互补性。显然，缺少中国传统诗学的参照，西方诗学无法奢谈所谓的一般文学理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出发，美国华裔学者刘若愚一生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向西方学界介绍中国传统诗学的“铺路”工作。在《中国文学理论》一书的绪论中，刘若愚开宗明义地表示：

在写这本书时，……第一个也是终极的目的，在于提出渊源悠久而大体上独立发展的中国批评思想传统的各种文学理论，使它们能够与来自其他传统的理论比较，从而有助于达到一个最后可能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An eventual 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我相信，在历史上互不关联的批评传统的比较研究，例如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比较，在理论的层次上会比在实际的层次上导出更丰硕的成果，因为对各国别作家与作品的批评，对于不谙原文的读者，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而且来自一种文学的批评标准，可能不适用于另一种文学；反之，属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文学思想的比较，可能展示出哪种批评概念是世界性的，哪种概念是限于某几种文化传统的，而哪种概念是某一特殊传统所独有的。进而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因为批评概念时常是基于实际的文学作品），哪些特征是所有文学所共同具有的，哪些特征是限于以某些语言所写以及某些文化所产生的，而那些特征是某一特殊文学所独有的。如此，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可以导致对所有文学的更佳了解。^①

刘若愚的上述见解在西方诗学界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得到了西方比较学界一些有识之士的赞赏与首肯。美国学者纪廉（Guillen）曾赞同地表示，“在某一层意义说来，东西比较文学研究是、或应该是这么多年来（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所准备达致的高潮，只有当两大系统的诗歌互相认识、互相关照，一般文学中理论的大争端始可以全面处理。”^②而迈纳基于东西方文化视野的比较诗学研究也是得益于刘若愚的启发。不过，更能体现西方比较学界态度转变的当属乌尔利希·维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美国学者维

① [美] 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② 转引自叶维廉：《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斯坦因一向以治学严谨、持论公允为国际比较学界称道，他早年撰写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一书被公认为关于比较文学的权威性著作，然而就是在这本书里，他对跨文化间的比较研究持怀疑与否定的态度，正如他在书中所言：“我不否认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但却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这些共同的因素如果差不多同时发生，就被看作有意义的共同潮流，即便超越了时空的界限，也常常形成一种令人惊异的黏合剂，……而企图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则较难言之成理。”^①但随着西方比较学界对于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日益关注，他对自己的上述观点作了反省，对未能在过去看到东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的必要性感到后悔。通过与中国同行们的交流，他提出了“绝对的平行”的观念，对那种没有事实联系的，非历史的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持肯定态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识到与包括中国诗学在内的东方诗学体系进行对话的必要性。可以说，西方学者掀起的一轮又一轮的与东方诗学对话的热潮，既得益于西方比较诗学界对东方视野的拓展，同时也是比较诗学渴望走向深化的历史必然。

总之，正是相互间的“互见”及借鉴的需要使得中西诗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对话之途。不过，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也清楚地看到，由于中西方所面临的对话语境存在着明显的分野，两者对于对话的期望是不尽相同的。对于中国诗学而言，对话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在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以此来推进当代文艺学的建设，诚如黄药眠、童庆炳在《中西比较诗学体系·序言》所表述的：“中西比较诗学正意味着一种返回原初诗意根基的举动。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相比较，固然要寻求二者的共通性与差异性，但根本目的并不在此。这个比较本身并不基于一个无所不在的视点，而只能是基于中国诗学的前景这一特定视点。这一特定视点是由我们的‘成见’构成的。我们总是基于自己的‘成见’、从自己的‘成见’出发、超乎‘成见’而又返回‘成见’去比较的。中西诗学的比较，说到底为的是中国诗学的前景。而这种前景并不能凭空猜测，我们宜站在原初诗意根基上去眺望前景。所以奔向前景正意味着返回原初根基。因此，中国诗学是为了解决自身问题、为摆脱

^① [美] 乌尔利希·维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自身困境而求助于中西比较诗学的，这种比较实际上就是对中国诗学自身的原初诗意根基的寻找。”^① 而对于西方诗学而言，对话的真正目的在于调整自身诗学体系的褊狭与不足，使之上升为一种更具普泛性及适用于更大范围的共同诗学。当代“欧洲中心主义”的破除和第三世界文化的蓬勃发展，使得西方人清楚地意识到，再像过去那样把西方诗学奉为唯一正确的准则去衡量、评判其他民族诗学已绝无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人要对一切民族的诗学体系抱有等量齐观的态度。在这方面，厄尔·迈纳说得十分坦城：“我们拒绝相信在不考虑特定的时代或文化的条件下，一种事物与另一种事物一样好。我们之所以拒绝相信，是因为我们自身的价值观、理念或者趣味的复杂组合，还因为我们各种各样的社会观或政治观、宗教观或哲学观。……我们中间没有谁能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任何观念都同别的观念一样好，无论什么历史条件或文化条件都可以阐明它们。”^② 因此，尽管迈纳对西方人把奠基于亚里斯多德《诗学》之上的模仿诗学看作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泛性诗学提出了质疑，但这并不妨碍他宣称：“就我们所知，亚里斯多德是我们所拥有的对作为人类知识一个独立分支的文学的性质进行明确而具有独创性研究的最为完美的典范。其篇幅也许是短了点，但《诗学》是不同文化体系出现的诗学中最为持久、最富于生命力者”^③，“认为应将西方文学连同其批评一起摒弃就像认为西方文学体系是唯一正确的、其他的都是异端邪说一样，是不理智的”。^④ 而对于中国诗学呢？迈纳一方面承认它对于全世界的比较诗学十分重要，但另一方面，他又直率地指出：“中国文学的观点对我来说特别难以接受。我受到的关于文学批评的教育使‘遗传谬论’原则在我心目中变得根深蒂固。尽管时间的流逝已让我能够把它悬置于两件事实的支点之上，我依然保持着这一偏见。”^⑤ 其实，西方自亚里斯多德把“诗学”独立为伦理学、政治学、哲学以及他所命名的其他学科之外的一门科学之后，

① 黄药眠、童庆炳：《中西比较诗学体系·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② [美] 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中文版前言》，王宇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③ [美] 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中文版前言》，王宇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④ [美] 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中文版前言》，王宇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页。

⑤ [美] 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中文版前言》，王宇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7页。

一直强调诗学理论的普遍有效性，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并没有随着“欧洲中心主义”的破除而消亡，而是借助对“共同诗学”的寻求得以重塑。为此厄尔·迈纳特地提出了一种名为“假设的同一性或普遍性”的比较诗学研究理论，即“把各国文学都具有的那些概念的、认识的和历史的共性因素分离出来。一旦把这些因素分离出来，我们就获得了足供研究的同源关系或对称性（不是真正的同一性），使比较的研究具有意义。”^①在迈纳看来，这种人为的研究方法不仅仅是要为比较诗学提供一种研究上的“可比性”，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获得一种他称之为“整体性的”或“系统性的”诗学。^②建立于“共通”、“一致”之上的“共同诗学”固然已非昔日的“欧洲中心论”可同日而语，但它的核心是西方诗学则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毫无疑问，中西诗学在展开平等对话的同时，仍然存在着一个以谁为主的问题。我们决不应该将对话的主动权拱手相让。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与西方诗学对话中寻求传统诗学现代转型的同时，必须对西方式的“共通性”、“一致性”保持一种民族性的警觉。一旦背离了上述立场，将使我们在中西诗学对话中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事实上，当前中西诗学对话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已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我们正陷入中西诗学对话的“危机”之中。

二、中西诗学对话的危机

对话，已成为当今中国比较学界的一个热门口号。应该说，走出自我封闭，主动寻求与西方诗学的对话，体现了中国比较学界可贵的自觉意识和令人称道的国际眼光。但与此同时，我们在与西方诗学的对话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我们究竟该如何来理解对话以及如何去实施对话，在这些方面，中国比较学界的应答显然差强人意，由此引发的中西诗学对话“危机”在所难免。

首先是理论层面的危机。如前所述，中西诗学对话是在中国传统诗学实现自身现代转型的特定历史语境下凸显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参与其中的中西诗学对话的终极目标必须是以实现中国传统诗学现代转型作为其最后的归宿，然而占据中国比较学界的主导性意见却是：中西诗学对话的目的在于相

① [美] 厄尔·迈纳：《比较诗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几个课题》，见乐黛云、张文定主编：《比较文学》，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版，第433页。

② 参见[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第五章有关相对主义部分的论述。

互间的“理解”和“沟通”。乐黛云曾在《比较文学新视野》一文中，提纲挈领地总结说：“多元文化相遇，最重要的问题是能够相互理解。人的思想感情都是一定文化的产物，要排除自身文化的局限，完全像生活于他种文化的人那样去理解其文化几乎不可能。但如果我们只用自身文化的框架去切割和解读另一种文化，那么我们得到的仍然只是一种文化的独白，而不可能真正理解不同文化的特点。要达到上述目的，就必须有一种充满探索精神的平等对话，为寻求某种答案而进行多视角、多层次的反复对话。”^①此后，这一说法频繁地出现于中国学者的文章中。比如，曹顺庆就把“对话研究”列为他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五大方法论之一，并一再宣称：“‘对话研究’更注重沟通，或者说对话研究的基本目的就在于沟通”，“我们所谓对话研究，就是探讨东西两大文化系统的文学、诗学的相互理解与互相沟通”。^②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的新版《比较文学》教材也称：“对话的目的在于沟通，在于通过对话达到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文学（包括文学理论）的互相理解，推动文学向着世界性、现代性的方向前进”。^③不可否认，中西对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进双方“理解与沟通”的作用，但是，对于中西比较诗学而言，“理解与沟通”绝不应是中西诗学对话的全部目的，甚至可以说不是主要目的，因为中西比较诗学的最终目的不在于达致相互间的交流与沟通，而是以实现自身诗学建构为终极指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西诗学对话作为一种深化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手段，其最终目的必定是服从于中西比较诗学的最终目标的，因此，中西诗学对话的最终目的并不止于和西方诗学寻求“理解与沟通”，而是要通过与西方诗学的平等对话，最终实现中国当代诗学的理论建构。关于这一点，钱中文曾正确地指出：“东西文化交流的目的，自然在于互通文化上有无，形成文化互补，但这不是目的的全部，而交流的深层意义还在于引入外国文化中的有用部分，用以激活本土文化，从而进入创新，推动整个文化的发展”。^④在他看来，不唯文化对话是这样，东西方文学理论的对话也是如此，所以，他把中西文学理论的对话概括为“误

① 乐黛云：《比较文学新视野》，见乐黛云等主编：《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② 曹顺庆：《中外比较文论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

③ 陈惇、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

④ 钱中文：《对话的文学理论——误差、激活、融化与创新》，见乐黛云等主编：《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差、激活、融化与创新”。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人们几乎众口一词地把“对话”偏解为“理解与沟通”，钱中文的上述主张一直未能引起中国比较学界应有的重视，其中的缘由的确引人深思。

多年来，中国比较学界一直热心倡导中西诗学对话，这个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不应否认人类之间存在着“一致”与“共通”之处，但一致性与共通性的获得绝不能是以牺牲民族性、差异性为代价的。在这方面，我们不妨听听美国系统学家欧文·拉兹洛（Ervin Laszlo）的告诫：

真正的创造性并不导致一致性。人们对过时的信念提出质疑，而科学、艺术和宗教则提供更深刻、更确当的价值观念，这并不意味着全世界的观念、价值观念和世界观都必须相同的。大转变及其多种分叉有许多方面。不同文化的人所信奉的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观念只要互不对抗，就能使当代世界增添丰富性和活力。对于所有复杂的系统——自然生态、绘画的形式和颜色、交响乐的乐音等——以及全球人类活动和居住的系统来说，多样性是必不可少的。

21 世纪在文化上可能是多样的，而且也是可行的。实际上，只有在文化上是多样的，才可能是可行的：一致性在人类领域里可能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是极其有害的。^①

因此，中西诗学对话的当务之急不是“总结不同文化体系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从不同语境，通过对话来解决人类在文学方面的共同问题”，而是恢复对话的应有之义，向各种形式的话语“独白”宣战，在多元对话格局中实现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由于中国比较学界，一味强调中西诗学对话的一致性、交流性，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中西诗学之间的差异性和对话的建构性，使得我们未能真正置身于中西诗学的对话当中，中国诗学更多的是充当了被西方诗学阐发、说明的角色。

其次是实践层面的危机。这是理论层面的危机在实践层面的直接延续。由于中国比较学界把中西诗学对话偏解为“跨文化的理解与沟通”，于是，在寻求中西诗学对话的具体路径上，除了强调中西诗学间的相互译介外，尤

^① [美] 欧文·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李吟武等译，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121 页。

其重视中西诗学间的双向“阐发”。作为由中国学者首创的研究方法，阐发研究一直被视作与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相并列的一种基本的比较文学方法论。^① 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它又引人注目地同中西诗学对话联系在一起。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大陆学者杜卫对阐发研究的下述界定：“一种跨文化地借用文学理论模式的比较文学研究策略和方法。它是在充分理解、审慎选择和适当调整的基础上，采用某种具有跨文化适应性的理论和方法来比较、印证、概括、解释别国文学，由此使研究成为一种介质、一种对话、一种融合，并为进一步的跨文化对话提供可交流与可理解的话语。”^② 稍后，台湾学者古添洪也强调说：“所谓‘援用’、所谓‘阐发’，并非消极的、主从的关系，而是积极的‘辩证’与‘对话’。”^③ 正是在这些观点的鼓动下，中国比较学界乐观地认为：“‘阐发研究’是一种‘开辟道路’式的研究，好比战场上的先头部队，担负着开辟道路、扫清障碍等任务，为后续部队打开一条前进的通道。阐发研究正是使中国文学真正介入国际性文学交流与对话，寻求中西融汇通道的最佳突破口，它创造了从术语、范畴到观点和理论模式等多方面的沟通的条件，扫清了中西方相互理解的一些障碍，为中西比较文学开辟了一条前进的通道”。^④ 在他们看来，阐发研究作为中西诗学实现对话的必由之路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探究一下“阐发研究”的历史流变及理论内涵，上述的结论远非那么可靠。

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学者如王国维、吴宓、朱光潜等人已事实上开启了援用西方文学理论来阐发中国文学及文论的先河。不过，“阐发法”作为一种特定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正式提出却是二十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陈慧桦在他俩所编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一书的“序言”中大胆地把晚清以来中国学者“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称作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派”^⑤。三年后，古添洪在《中西比较文学：范畴、方法、精神的初探》

① 参阅刘象愚：《比较文学方法论探讨》，见钱中文主编：《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页。

② 杜卫：《中西比较文学的阐发研究》，《中国比较文学》，1992年第2期。

③ 古添洪：《中国学派与台湾比较文学界的当前走向》，见黄维梁、曹顺庆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垦拓——台湾学者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页。

④ 曹顺庆：《中外比较文论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4页。

⑤ 古添洪、陈慧桦：《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序》，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版，第2页。